

国内外数字化外语教材二十年研究进路对比分析

陈文婷, 曹妍妍, 杨鲁新

摘 要: 数字化教材是当前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教材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对近二十年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文献分析发现, 其研究进路逐渐开始从实体思维转向实践思维, 具体表现为从最初以静态文本为主的、无主体及去情境化的研究视角及范式, 转变为以师生为主体视角、以教材使用的教学实践为研究情境对教材的质和属性进行动态探寻。对当前以实践思维主导的研究范式变革的探索, 是把握数字化教材研究特点与走向的关键。本文对上述两种进路的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进行综合述评, 以期对未来数字化教材研究提供范式思路和方法路径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外语教材; 研究进路; 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24)03-0069-06

Abstract: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material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ducation era.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digit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 new trend can be found from episteme to phronesis in terms of research approach,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atic text oriented, non-subject and de-contextualized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paradigm to the dynamic explor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attribut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subjects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extbooks as the research contex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paradigm dominated by phronesis is the key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above two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digit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in paradigm and method for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digit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research approaches; research trends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4.03.019

1. 引言

当今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传统教学实现了深刻变革, 教材形态也由此发生了极大变化, 从静态的、单一的纸质呈现形态向动态的、交互性的数字化形态转变。数字化教材“因其强大的多媒体功能、交流与反馈功能、网络平台远程支持功能, 能够满足以人为本的教育需要”(王志刚、王润 2021: 140)。21 世纪以来, 现代信息技术驱动着全球外语教学奔向了数字时代, 使其迅速从规模化、标准化向定制化、个性化的新形态转变, 其特征之一是出现了丰富、开放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成为了推动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工具(杨宗凯等 2022)。近年来我国的数字化外语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对外语教材的研究却寥寥可数。

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存在两种不同范式的科学进路, 即实体思维和实践思维。实体思维源远流长, 是以客观描述作为诠释存在的方式, 认为事物的质和属性为事物本身所固有, 因此探索世界只需探索“实体”本身; 实践思维突出主体及其实践的主导地位, 以主体当下的实践作为把握对象, “存在诠释为由主体能动的实践显现”(孙美堂 2003: 9)。近 20 多年的相关研究显示, 研究者

基本沿袭了实体思维和实践思维两条学术进路, 分别从教材本体和教材实践两个视角对数字化外语教材进行探索。教材本体视角将教材相关因素预设为客观存在的实体, 从教材建设、编写、技术、内容、出版、发行等层面来探讨教材属性及特征; 教材实践视角聚焦基于教材内容和数字手段的课堂教学活动设计、关注学生学习成效及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回顾上述两种进路下的研究学术史及其方法路径, 有益于推动本土化的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实证研究。基于此, 本文对国内外近二十年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全面考察, 从研究内容、视角及立场等维度呈现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进路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2. 研究设计

2.1 文献来源

检索发现, 国内外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研究均发端于 21 世纪初始。鉴于此, 本研究以近 20 年(2003—2023 年)国内外数字化外语教材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关于数字化教材的概念,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尚未完全统一。因此, 本文里国内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和 CSSCI(来源及扩展期刊)文献, 其中以“数字化外语

教材”“电子外语教材”“新形态外语教材”“立体化外语教材”“混合外语教材”等作为主题及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有效样本文献 86 篇;国外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文献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作为检索平台,以 digital textbook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digit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multimedia textbook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等为检索词,检索到 102 篇英文文献。之后,本研究对所有检索文献进行严格筛选,剔除书评、会议通知及摘要等非研究性文献以及综述类文章,最终获取文献 117 篇,分别导入 Excel 并编号,形成本研究文献库。

2.2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定量分析借助 Excel,对所有文献数据进行发文量的统计及高频关键词分析;定性分析按照质性研究数据分析原则(Richard 2003),采用三级编码方式将所有文献中的意义单位进行逐级的类属归纳,并对各单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关联性分析,最终形成基于教材本体及实践两类研究进路的编码框架(见表 1)。

表 1. 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内容分析框架

类别	维度	内容
教材本体研究	出版发行	数字化出版、立体化教材出版、新媒体网络环境、多媒体环境、出版传播、出版创新、复合式外语教材、CBI(内容依托教学法)、出版融合
	设计编写	教材编写原则、特征、理据、内涵、问题、策略、理念
	建设研发	信息技术、教育技术、教材的多模态设计、数字化建设、立体化教材建设、互联网资源、网络教材开发、教材开发的适用性、慕课和 AR/VR
	演变发展	教材发展趋势、启示、现实境遇、挑战和应对策略、发展历程
	价值评估	标准规范、关键要素、价值、限度、影响
	内容分析	教材概念、功能、特征、优缺点、与纸质教材比较
教材实践研究	课堂使用	混合学习、学习活动模式设计、教材应用模式、教师及学生的态度、兴趣、动机及使用习惯、教学效果
	教学设计	数字教学工具、微翻转课堂、多模态语料库、线上任务、移动学习模型

3. 研究发现

3.1 研究进路现状:“实体”与“实践”溯源

国内关于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依次为大学英语、外语教材、数字化、教材出版、多媒体、英语教材、网络教材、网络教学、电子教材、电子课本、小学英语、自主学习、出版发行、出版传播等;国外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高频关键词依次为 skills、education、students、vocabulary、literacy、comprehension、syntactic enhancement、digital scaffolding、technology、reading fluency、prosody、text 等。从上述高频词可以明显看出国内外两种不同的学术进路:国内研究热点主要聚焦教材本体,多从宏观视角对教材进行介绍和解读,逐渐形成了以实体思维为

主、以理论研究为范式的学术进路;国外研究重点关注基于教材的教学活动及技术创造的学习环境,探寻教材使用问题及具体效用,表现为以实践思维为主、以实证研究为范式的学术进路。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目标及视角,通过各自的方法路径和研究范式,从教材本体和课堂教学两个侧面解析了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核心概念及问题。

3.1.1 实体思维:技术开发与规范标准的描述分析

1) 研究内容:概念属性

实体思维下的教材研究将教材视为客观的“脱离教育实践情境的观念性、概念性知识体系”(柳叶青 2017:26),是对教材“质”的还原,以理论研究为主,将文本知识和内容属性作为探寻的对象。近二十年关于数字化外语教材本体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教材概念内涵及特征属性的分析。首先,关于其概念内涵,学者们指出数字化外语教材是数字化学习素材与管理学习过程的信息系统(钟启泉 2019),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认识科学的发展以及外语学习理论的发展而研发的智能化教学资料,由数字化课程、数字化信息库、数字化资源库和网络服务平台 4 部分构成其框架模式,基于云课堂和大数据的教学资源提供个性化和互动式的教学服务(Amziane & Guendouzi 2015;鲍敏、李霄翔 2017)。数字化外语教材强调融合过程、跨学科、互动式、可视化的学习方法,从而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提高外语学习效率(庄智象、黄卫 2003)。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探讨了数字化外语教材的特征属性,指出由于信息技术的介入,数字化外语教材有了显著的技术属性,并在教材体系、资源载体、知识获取、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等多个方面呈现,有集成性、多样性、交互性等特点及多模态性和超文本结构,特别是在读写任务上具有出流动性、开放性、多角度等特征,从而能够多维度传达信息,便于信息检索(Li 2021)。总体来讲,国内外学者均认同数字化外语教材的重要作用,即在“互联网+教育”时代实现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真正融合的探索与尝试(Nadezhda *et al.* 2021;张敬源等 2017)。

2) 研究视角:规范标准

在探寻数字化外语教材概念属性的基础上,实体思维下的研究重在对教材设计、开发等基础工作的探索,“研究视角注重宏观理论探讨和客观研究者剖析”(常畅、杨鲁新 2023:82)。数字化教材是与传统纸质教材高度关联又截然不同的教材新形态,在编写、设计、开发、建设及出版等层面有其独特之处,是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从整体上看,研究者们多从信息技术与教学手段深度融合的视角来讨论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建设和编写原则,指出数字化教材需要遵循完整性、模态协作化、模态分配分类化、超文本化、个性化及协作化等编写原则(张德禄、张淑杰 2010),连结在线课程和课堂教学,利用智能化传播介质融合在线平台、移动学

习终端、资源二维码等手段呈现多模态资源(张敬源等 2017),并通过分析数字化教材中的电子课程内容和技術组成部分,创建统一的交互式教育媒体空间(Kolesnikov *et al.* 2021);学习者也是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因素,教材编写需在充分了解学习者专业水平及学习需求的基础上,以全方位激发学习动机为目的,利用线上资源创设真实语境(陈坚林、赵学旻 2003),以全方位的语言学理论、学习理论和外语教学法为指导采用多种媒体形式(马俊波 2006)。此外,数字化教材的呈现应充分利用现代工具作为载体,例如可充分挖掘 iPad 电子教科书的一体化功能(词典、超链接和笔记功能)(Park & Lee 2021)。总之,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建设要从教材内容的选择、教材结构的设计、教学组织模式和评价考核方式的构建等方面,全方位地为学生提供跨学科、互动式、可视化的外语学习环境(Nadezhda *et al.* 2021)以及能够增强教学互动的技术辅助课程任务(Blake 2020)。

3) 研究立场:教材客体

评估教材质量可以有效反哺教材建设(Tomlinson 2012)。实体思维下的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注重教材的质量与效用,研究者主要基于对教材本体的描述分析作出判断。例如,在技术层面,当前的数字化外语教材出现了数字化开发不均衡,数字资源开发过于简单、网络学习终端不完善、网络互动不充分以及开发、创新不足,教学交付资源欠缺等问题,需要建立教辅资源库和共享平台,有序开放课程资源、实施有效的教学管理控制;在内容层面则呈现出封闭、单一性和课程体例流程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此外实用性和普及型均有待加强(Blake 2020)。实体思维下的数字化外语教材也关注教材的适用性问题,指出是否有利于呈现外语类教材的多模态性、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等是衡量教材适切价值的重要标准(Nadezhda *et al.* 2021)。

3.1.2 实践思维:教材使用与课堂教学的实证探索

1) 研究内容:使用实践

实践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从实践的视角看世界,以主体当下的实践作为把握和诠释文本的切入点(孙美堂 2003)。此思维指导下的教材研究强调“主体”(人)和实践过程的主导地位,认为教材的质和属性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更加关注教材的使用问题。例如,有学者调查早期数字化教材在外语技能学习中的使用比重,发现听说模块中的数字化资源使用率要远高于读写模块(Cinkara 2018);有学者调查数字化外语教材的使用优势,指出其提供的个性化沟通模型和轻松活跃的学习环境(Shabudin *et al.* 2014)对于学习者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影响因素分析是国内外教材使用研究的热点(王志刚、王润 2021),其中包括技术层面的障碍如缺乏基础设施带来的数字鸿沟、学生在访问教材电子端时遇到的各种技术挑战(Vasil-

eiou *et al.* 2012)等;也包括使用者的主观感受对于教材使用的影响,例如师生对教材的满意度(Oliveira *et al.* 2014)和认可度(庄绍勇等 2013;田嵩、魏启荣 2014)与教材的充分使用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Jo *et al.* (2013)的研究也发现由于习惯于传统纸质教材,教师认为使用数字化教材无法像传统课堂一样及时收集学生反馈意见,而学生也认为教师未能充分使用数字化资源,其教学设计活动与教材内容不匹配。也有学者调查使用环境对于教材效用的影响,发现在相对包容、宽松且开放的外语教学环境中数字化教材的效用将会被发挥到最大化(Oliveira *et al.* 2014)。此研究表明师生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未来关于教材使用影响研究的一个可参考因素。

2) 研究视角:课堂教学

作为全新的教材形式,数字化外语教材进入课堂后势必会带来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实践思维下的相关研究聚焦数字化教材影响下的外语课堂现状,特别是对基于教材的教学模式探索(赵舒静 2018)和教学理论创新(毕争 2019)。研究者发现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及外语学习兴趣有了显著改善(Joo 2009),并由此带来了语言技能的提升,包括在数字环境中构建复杂句型的能力(Blake 2020)、听力理解及阅读理解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Park & Lee 2021)。此外,数字化外语教材在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及学习元认知等学习策略、提高学习动机及效率、拓展语言视野和发展语言能力及促进自主学能力及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与传统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非常相似,学生参与度较少且被动,发言内容简短,缺乏整体输出能力,因此提出单纯将新技术工具整合到课堂中难以促进外语课堂的互动,重点在于教师利用数字化教材的丰富资源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Semaeva *et al.* 2022)。由此可见,只依赖“数字化”的介入而忽视“教科书”的属性只能使技术与纸质教材处于“拼接”状态,而基于课堂的师生教学活动更强调技术辅助下教学模式的真正创新。

3) 研究立场:使用者主体

主客体分离的实体思维导致了教材“往往被视作脱离教育实践情境的观念性、概念性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和去情景化的特征”(柳叶青 2017:26),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践思维下的教材研究立场从教材客体转到使用者主体。其中,学习者作为课程实施的对象及教材使用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了广泛关注。此类研究重要聚焦影响数字化外语教材效用的学习者因素,包括学习者的教材使用兴趣和策略、自主学习控制力度、自我调节能力和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材的期望、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及使用意愿等(Joo *et al.* 2017)、使用态度与学习适应性(杨港 2019)等;而教师作为使用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近年来

相关研究的关注对象。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数字教材研究注重探索一线教师如何基于教材基本功能展开“教材解释”,即激活“教育内容—教材—活动”这一教学过程的教育功能(钟启泉 2019);在此基础上调查教师的数字素养状况(杨港、彭楠 2021)。例如,Allen(2015)分别调查了职前和在职外语教师对数字化教材的态度和看法,结果发现那些“数字原生代”的职前教师依赖传统教材组织课程,而那些更有经验的“老”教师却对数字化教材表现出浓厚兴趣。此结果与对教师数字素养现状的普遍设想形成鲜明对比,提示我们可将数字化教材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研究的全新视角。

3.2 研究转向

虽然研究路径不同,但上述两种研究都力图通过全景式扫描呈现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应然和实现状态,对提升教材质量和效用提供了可行对策。对比两种进路发现,实体思维注重对教材“是什么”的分析,将教育实践活动排除在外,因而易于忽略教材的使用过程及其价值意义;实践思维则注重对教材“如何用”的探索,往往忽视理论研究引领数字化教材发展方向的重要性。而当下的研究进路出现了从实体思维逐渐向实践思维的转向,具体表现为从最初以静态文本为主的、无主体及去情境化的研究视角及范式,转变为以师生为主体视角、以教材使用的教学实践为研究情境对教材的质和属性进行动态探寻。对当前以实践思维主导的研究范式变革的探索,是把握数字化教材研究特点与走向的关键。

3.2.1 研究视角:从技术到课堂

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创建和发展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因此技术因素长时间成为了相关研究的关注重点。探讨技术如何赋能教材的确有助于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然而,“检验数字教材质量的主战场是课堂教学”(王志刚、王润 2021:140),教学属性永远是任何形态教材的本质属性,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研究也应回归至教材的教学本质。一方面,基于数字化教材的外语教学在未来必将从标准化和规模化向个性化和定制化转变,从而引起外语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各环节的深度变革,对教学环境、内容、方法、模式、动机及学习体验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数字化改造(杨宗凯等 2022)。然而,技术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融入上述环节等问题尚未明晰,长时段、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还有待丰富;另一方面,基于教材使用的真实课堂情境,调查师生对于教材的接受度及使用反馈等,以此评估数字化外语教材的适切性或教学适用性,同时辨析某种知识需要承载于哪种技术媒介才能有更好的教学效果等,以此来反哺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开发和完善,能够促进数字化教材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数字化教材中的内容、目标、技术及其相关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最终优化教学效果,彰显技术能够切实促进外语教育教学发展的实践品格(钟岑岑、余宏亮 2021)。

3.2.2 研究内容:从分散到融合

在宏观层面,数字化外语教材作为教材的一种新形态,是实施国家课程的载体和保障,而相应的研究也应站在促进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进行整体设计。鉴于目前关于教材本体及实践的研究依然各自为政的局面,未来应建立开发者、管理者、使用者及研究者等多元合作群体共同参与的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共同体,一方面打通教材编写、开发、出版、使用、评估到后续改编等各环节进行历时研究,追踪教材从策划到落地的全过程,特别关注教材在教学场景中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跳出教材本身,关照我国教育目标和学科课程设置等要素,以相关教育教学理论为引领,考察数字化外语教材如何推动教学改革及社会发展,以丰富的实证研究为数字化外语教学的推进提供参考。在微观层面,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需要彰显外语教学的跨学科属性,汇总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多模态数据进行教学法探究;融合前沿学习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探查将学习者基于数字化教材所发展的语言知识、技能、文化、情感价值观、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等多项外语技能,及其在上述技能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的心理状态、情感劳动等因素,重点辨析技术在此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从而系统、全面地探究数字化外语教材对外语教学的效用。

3.2.3 研究立场:从管理者主体到使用者主体

课程作为实施国家课程的媒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代表正统性和合法性的群体,以“管理者”身份参与到教材建设的全过程中。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在教材数字化的背景下,这种自上而下的参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材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对教学和师生发展的价值意义(Amziane & Guendouzi 2015;柳叶青 2018)。教材的课程属性决定了其价值实现脱离不了实施课程的主体——师生。此外,大量研究也表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基于个体理念、风格和知识背景,教师和学习者会不同程度地通过调整、删减等手段选择性地使用教材,而不是完全忠实于教材(Cinkara 2018;徐锦芬、范玉梅 2017)。因此,将师生纳入到教材建设、编制等活动的主体,再以师生立场去关注教材实际使用情况,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透视师生主体与教材的复杂互动关系,从教和学的角度评价教材的适切性和有效性,同时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对于师生的冲击和挑战,是未来数字化外语教材研究的重要趋势。

3.2.4 研究范式:从描述分析到整合突破

如前所述,无论是关于教材的本体研究抑或是实践研究,教材始终不是客观的外部知识,而是师生不断与其进行意义协商和知识建构的活动载体。因此,完全脱离情境的描述分析或仅对某一阶段使用情况的共时研究很难把握数字化教材动态交互的全貌。目前国内关于数字化教材的研究“偏重‘数字化’的努力,而缺少‘教科书’的特征”(牛瑞雪 2014:23),研究多是对教材

数字特征的描述,使得技术与教学仍处于“拼接”而非“融合”阶段。尤其在当下数字化教材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应整合多种研究方法以寻求方法论突破,实现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直接与间接相结合、质性与量化相结合(柳叶青 2018)。例如通过历时研究调查分析追踪使用过程、通过实验研究和测试分析等探析教材使用效果等;同时尝试教材研究的“智能转向”,即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挖掘教材的相关前沿问题,把握发展趋势,通过预测性分析关注数字化教材的建设与评估相关问题(王攀峰 2019)。

4. 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近 20 年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发现研究者们基于不同主题及视角,通过多种方法路径和研究范式,从教材本体和教材实践两个视角解析了数字化外语教材相关问题。整体来讲,国内学者更关注教材本体,研究主要围绕教材的特征、编写、建设、开发等方面展开,“多数研究将教材视为客观存在的知识实体”(常畅、杨鲁新 2023:81),进而对其进行“质”的踏寻;国外学者多集中在教材实践研究,包括教材的使用活动、基于教材的教学实践、师生满意度调查及教与学成效等,是对教材“用”的追踪。因此,未来研究可在融合上述两种进路的基础上,注重数字化外语教材在课程和教学领域的应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延伸探索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对未来外语教材研究能够提供有益启示。一方面,在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的今天,探索数字化外语教材的建设和使用等问题是未来我国外语教材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应加大成果产出、丰富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一切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指向教学质量提升和师生个体发展。由于数字化外语教材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到底如何使用数字教材才能真正赋能课堂教学需要进一步的学理研究与实践探索”(王志刚、王润 2021:142)。未来应加强教材使用实践的相关实证研究,为提升数字化外语教材效用,使其更好地服务我国外语教育教学。

参考文献

- [1] Allen, C. Marriages of convenience? Teachers and coursebooks in the digital age[J]. *ELT Journal*, 2015(3): 249-263.
- [2] Amziane, H. & A. Guendouzi. Algerian EFL course, the digital compete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J]. *Arab World English Journal*, 2015(4): 70-77.
- [3] Blake, R. J., Guillén, G. & S. L. Thorne. What is the right technological fit for L2 learning? [J]. *Brave New Digital Classroom: Technolog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2020: 35-66.
- [4] Cinkara, E. Analysis of EFL teachers' use of digital components: Evidence from self-report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J]. *Eur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8(74): 41-60.
- [5] Joo, H. The effectiveness of a multimedia electronic English textbook

-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J]. *Multimedia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09(1): 9-33.
- [6] Joo, Y. J., Park, S. & E. K. Shin. Students' expectation,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use digital textbook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69): 83-90.
- [7] Jo, I. H., Heo, H., Lim, K. Y., Choi, J. I. & J. M. Noh. Usability study of middle school English digital textbook: A stimulated recall approach[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2013(1): 109-136.
- [8] Kolesnikov, A., Bogovskaya, I., Krasovitskaya, Y. & N. Spichko. Integrating an electronic textbook on a foreign language into the M. E. S. -System[J].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eacher Education*, 2021(4): 502-516.
- [9] Kupetz, R. & B. Ziegenmeyer. Blended learning in a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Integrated interactive e-learning and contact learning[J]. *RECALL*, 2005(2): 179-196.
- [10] Li, X. N. Textbook digitization: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21(4): 34-42.
- [11] Nadezhda Mingazova, N. G., Subich, V. G. & A. I. Gazizova. Usage of Digital Educational Sources in Arabic Teaching[J]. *Utopia Praxis Latinoamericana*, 2020(12): 346-355.
- [12] Oliveira, J. D., Camacho, M. & M. Gisbert. Exploring student and teacher perception of E-textbooks in a primary school[J]. *Media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014(21): 87-95.
- [13] Park, J. & J. Lee. Effects of e-Books and printed books on EFL learn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grammatical knowledge [J]. *English Teaching*, 2021(3): 35-61.
- [14] Richard, K. *Qualitative Inquiry in TESOL* [J]. New York: Macmillan, 2003.
- [15] Semaeva, O. V., Azmetova, R. F., Novikova, V. N. & M. E. Ivanova. Digital teaching tools as a means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non-linguistic universities [J]. *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22(1): 1-5.
- [16] Shabudin, M., Aisyah, A., Darus, S. & N. Mimiko.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utilization of Web 2.0 in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0): 433-441.
- [17] Tomlinson, N.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J]. *Language Teaching*, 2012(2): 143-179.
- [18] Vasileiou, M., Rowley, J. & R. Hartley. Metadata and providing access to e-books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3): 518-528.
- [19] 鲍敏,李霄翔. 信息化环境下数字化大学英语教材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3): 80-84, 96.
- [20] 毕争. “产出导向法”与“任务型教学法”比较: 教学材料设计与使用[J]. 外语教学, 2019(4): 61-65.
- [21] 常畅,杨鲁新. 我国英语教材研究 60 年述评——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外语界, 2023(1): 76-83.
- [22] 陈坚林,赵学旻. 关于编制商务英语立体教材的探讨[J]. 外语电化教学, 2003(3): 44-47.
- [23] 柳叶青. 从实体思维到实践思维: 当前教材评价研究的新趋势[J]. 课程·教材·教法, 2017(12): 24-30.
- [24] 柳叶青. 方法论视角下的国内外教材评价研究立场与路径评析[J]. 基础教育, 2018(3): 66-75.

(下转第 100 页)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7.
- [6] 李庆明, 刘 曦. 秦腔剧本英译的多模态化与意义重构——以《杨门女将》英译本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2): 98-103.
- [7] 李奕华. 新时代黄梅戏海外传播中的译介探究——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2): 149-156.
- [8] 刘宝杰. 试论京剧行当和剧目名称翻译[J]. 中国京剧, 1995(4): 15-17.
- [9] 刘冰琳. 秦腔“走出去”之译者认知对秦腔译介内容制约研究[J]. 外语教学, 2019(5): 89-92.
- [10] 刘 桐. 也谈京剧英译[J]. 中国京剧, 1995(5): 44-45.
- [11] 马士奎. 传统藏戏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20(2): 74-80, 95.
- [12] 苏 凤. 戏曲文本译介: 中西方文化的会接[J]. 戏曲艺术, 2016(3): 94-98.
- [13] 王宏印. 诗意与写意——《西湖遗恨》唱词英译略论[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S1): 73-78.
- [14] 王丽娜. 《西厢记》的外文译本和满蒙文译本[J]. 文学遗产, 1981(3): 148-154.
- [15] 王 璐. 国内外戏剧翻译研究综述[J]. 四川戏剧, 2016(9): 45-49.
- [16] 汪榕培. 《牡丹亭》的英译及传播[J]. 外国语, 1999(6): 48-52.
- [17] 杨才元. 昆曲翻译探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89-91.
- [18] 于洋欢, 董 雁. 译作的“边缘”——从副文本解读白之英译《牡丹亭》[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5): 127-138.
- [19] 张佳东. 试论梅兰芳剧团赴美公演事件中的京剧舞台翻译策略[J]. 上海翻译, 2021(1): 54-59.
- [20] 赵征军, 陈述军. 基于语料库的《牡丹亭》符号意象英译操作规范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8(1): 32-39.
-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英汉双向翻译转换思维过程与模式实证研究”(项目编号: 20AYY0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朱琳,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认知翻译研究、文学翻译、翻译技术与翻译教学等。
- 王努铨,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研究。
- 责任编辑 郑 荣
-
- (上接第 73 页)
- [25] 马俊波. 论大学英语立体化教材的开发[J]. 外语电化教学, 2006(6): 25-29.
- [26] 牛瑞雪. 我国数字教科书的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8): 19-25.
- [27] 孙美堂. 从实体思维到实践思维[J]. 哲学动态, 2003(9): 6-11.
- [28] 田 嵩, 魏启荣. 互动式电子教科书在课程学习中的应用与评价分析——以阿拉伯语听说课程为例[J]. 现代教育技术, 2014(1): 84-90.
- [29] 王攀峰. 教科书研究方法论[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 [30] 王志刚, 王 润. 中小学数字教材研究 20 年: 本土进展与域外考察[J]. 中国教育科学, 2021(5): 128-143.
- [31] 徐锦芬, 范玉梅. 大学英语教师使用教材任务的策略与动机[J]. 现代外语, 2017(1): 91-101.
- [32] 杨 港. “立体化教材+互联网资源”驱动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1): 23-29.
- [33] 杨 港, 彭 楠. 数字时代高校外语教材研究的自传式叙事范式[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2): 96-105.
- [34] 杨宗凯, 王 俊, 王美倩. 数字化转型推动外语教学创新发展[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5): 3-5, 105.
- [35] 张德禄, 张淑杰. 多模态性外语教材编写原则探索[J]. 外语界, 2010(5): 26-33.
- [36] 张敬源, 王 娜, 曹红晖. 大学英语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建设探索与实践——兼析《通用学术英语》的编写理念与特色[J]. 中国外语, 2017(2): 81-85.
- [37] 赵舒静. 基于纸质媒介与数字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新探——“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的融合创新之路[J]. 外语界, 2018(2): 93-96.
- [38] 钟岑岑, 余宏亮. 中小学数字教材研究 20 年: 历程、特点与展望[J]. 教育科学, 2021(6): 54-61.
- [39] 钟启泉. 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网络时代教材研究的课题与展望[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6): 1-7.
- [40] 庄绍勇, 耿 洁, 尚俊杰. 基于平板电脑的电子课本在香港英语课堂教学实施的个案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2): 92-99.
- [41] 庄智象, 黄 卫. 试论大学英语教材立体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外语界, 2003(6): 8-14.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大中小学外语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项目“全球外语教材与资源建设: 多维视角下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编号: 2022SYLZD014)、2023 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高校新形态外语教材师生评价标准研究”(项目编号: ZGWYJCY2023ZZ17)、2023 年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师发展研究重点项目“陕西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3JSFZA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陈文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讲师, 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外语教材、外语教师专业发展。
- 曹妍妍,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语教材、外语教学。
- 杨鲁新(通讯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言课程与教学、第二语言写作教学、外语教师教育、学术读写能力发展。
- 责任编辑 罗逸文